

乌托邦的叙事机理及其价值

周燕军

(杭州商学院 社会科学部,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要: 乌托邦作为一种人类对美好明天的永恒向往而存在, 对人类的生命体验和秩序革新形成了重大影响。乌托邦的逻辑前提在于对人性善、普遍正义、总体性生活以及结果性的公平正义的预设。乌托邦的逻辑前提内生了乌托邦的悖论和困顿。尽管如此, 乌托邦依然在哲学、文化、经济、政治诸层面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乌托邦; 叙事机理; 价值

中图分类号: B5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7)01-0038-06

DOI: 10.14134/j.cnki.cn33-1337/c.2017.01.006

On the Narrating Mechanism and the Values of Utopia

Zhou Yan-jun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Utopia exists as an eternal hope system of human's good life, and having great influences both on personal experience of life and order of human innovation. The preconditions of Utopia are natural goodness of human beings, universal justice, entirety life, and the result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Within Paradoxes and difficulties, Utopia still has philosophic, cultur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values.

Key words: Utopia; narrating mechanism; values

乌托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由来已久。作为一种与实践生活相背离的现象, 乌托邦的存在对人类个体的生命体验及整体秩序的革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乌托邦是人类对当下的永恒反思和批判, 是人类对“明天会更好”的坚定信仰。正是得益于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及其抗争, 人类的时间序列得以持续延展, 历史不至于终结。本文的立意旨在阐释乌托邦的由来和逻辑前提, 据以明晰乌托邦的叙事机理及其内在困顿, 并申明乌托邦对于人及人类社会的重要价值。

一、什么是乌托邦

莫尔在他的名著《乌托邦》之中, 首次正式使用乌托邦一词, 意指“虚无飘渺之地”。乌托邦的虚无飘渺有两重含义: 其一, 从空间角度看, 乌托邦是“无地之邦”; 其二, 从时间角度看, 乌托邦是“无时之

收稿日期: 2016-11-01

作者简介: 周燕军, 女, 杭州商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主要从事思想史与乡村治理研究。

邦”。乌托邦一词虽然使用于近代,但究其文本源头,一直可以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就是一个经典的乌托邦文本。乌托邦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对美好共同生活的建构。在乌托邦的秩序之中,一群天性本善并且将善的共同生活看成是首要价值从而可以忽视个体差异的人群集合在一起,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没有压迫、没有歧视。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充实灵动:白天生产黄昏赋诗。

对乌托邦的理解大体上可以划分成两种,一种是纯粹观念意义上的乌托邦(抽象的乌托邦),它所描述的是一种期望,属于“想象和期望的范畴”。这一范畴,维系了人类行为边界的无限可能性^[1]。另一种是作为运动的乌托邦(具象的乌托邦),它所指称的是崇尚乌托邦生活的人,力图将乌托邦现实化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基于抽象观念形式的乌托邦,造就具象的物质形式的乌托邦。就观念意义的乌托邦而言,《理想国》《乌托邦》《大洋国》《太阳城》《桃花源记》等经典乌托邦文本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作者对其所处的现实秩序的不满、忧虑和再设计。在对现行秩序的再设计过程中,又存在一个共同点,即无视现实的可能性的约束,因而这种再设计是纯粹理想意义上的。就运动形式的乌托邦而言,它要求人类摆脱异化状态,表现出来的常常是激进的“乌托邦工程”,向当下的文明体系全面宣战。诚如傅立叶所言,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藪”^[2]。

二、乌托邦的叙事机理

乌托邦的建构建立在这样几个假定的前提之上。(1)人性本善;(2)普遍正义是人的首要价值;(3)性本善的人出于对普遍正义生活的寻求,从而走到一起共同生活,在乌托邦的世界里建立起一种实现普遍正义的秩序;(4)个体的差异被总体性生活消解,结果性的公平正义得到实现。显然,剖析乌托邦需要从它的基本前提着手。

关于前提1的阐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只有在人与人交互行动的博弈过程中,人的善的属性才有可能被激发出来。出于自我保全的自然本能,出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人类在交互行动过程之中,必然会努力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互行动的效率。是否性善是人在既定规则和既定信息状态的组合中的博弈结果。在普遍关联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的交互博弈存在两组条件:信息对称或者信息不对称,规则健全或者规则不健全^①。据此,可以逻辑地导出人类可能的四种交互博弈场景。本文将这四种可能的交互博弈场景,分别标记为A、B、C、D,其博弈过程如下表所示:

规则 \ 信息	健全	不健全
对称	人性善(A)	人性善(B)
不对称	人性善(C)	人性通常为恶(D)

1. A型博弈。信息对称意味着双方都知根知底无所可以隐瞒,因而欺骗对手的可能性不复存在。在健全的规则约束下,“作恶”将会恶化个体的生存境况。个体出于理性,选择“善”的合作是最佳策略,因而博弈双方会不约而同地以“善”的面孔出现。

2. B型博弈。尽管缺乏足够明确、细化的规则,但是交互行动之中的博弈双方处在信息对称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那么,一方在作出某种策略选择之际,必然会按照常规意义上的逻辑(理性人的逻辑)来分析另一方的可能应对策略。由于双方都能认识到一方的破坏性行为必将

^①健全的规则,在本文中被定义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则”,即健全的规则出于人类自然秉性及正义诉求,规则的立意及其功能在于惩恶扬善,促进公序良俗。

遭到另一方的抵制和报复,选择“恶”将不会给自己带来较好的收益,博弈双方最终也会以“善”的面孔出现。

3. C型博弈。尽管博弈双方处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下,但是由于存在一个强力的规则约束,从而使“行恶”的风险极大提高(不诚实行为将要被查明并受到严厉惩罚),博弈双方最终还是诚实合作,表现出“善”的特点。

4. D型博弈。博弈双方是处在一个“无据可依”的“黑箱”状态之中^①。困境中的博弈双方都无法准确把握对方的策略选择。由于规则的不健全,即便“恶行得以查实”,也不会出现“恶报”的后果。个体生存在一种危机四伏的场景下,先下手为强的“作恶”选择,成为个体理性分析之下的优先选项。人性恶将表现无疑。

人性之“善”与否,是博弈者在特定规则和特定信息状态下的选择结果,是一种“不经意的合谋”。乌托邦则将人性本善看成是一种先验的判断,脱离了人的现实场景。

关于前提2的阐释。假定前提1是确立的,也并不是足以推出前提2。依据洛克的分析(假定人是“性善”的),自然人鉴于自然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不便,组织起来建立国家,开始公共政治生活,其意图并不是要制造一个利维坦式的强权来负责统治,而是要更好地保护个人自由,洛克式的国家是一个“弱的国家”。乌托邦的精神向度是对人类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永无止境的追求^{[4]1},其出发点是社会意义的,而非个人意义的。这样,乌托邦对普遍正义的寻求难免会催生一个新的极权意志,以阻止个体出于自由意志可能导致的对乌托邦秩序的背离。从价值层面看,乌托邦与极权主义是一致的。乌托邦需要构造并维系一种总体性。在这种乌托邦的总体性秩序里,需要经常性的总体主义的文化导引,构想一种美好生活图景。然而这种美好生活,需要具备经济层面的物质基础。经济上,乌托邦要求统一组织生产和分配。个体出于自身生活愿景的经济选择,不可避免地 and 总体主义的经济秩序之间产生持久的冲撞和裂痕。为了捍卫总体主义的乌托邦秩序,就需要借助于强权的介入,阻止个体的背离。乌托邦构想中的“诗画田园”的自由自在,难免被消解。崇尚自由的自由主义者,难以适应这种场境。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总是抗拒分配正义的理想,否认分配正义的可能性^[5]。乌托邦试图对整个社会进行总体性设计,不可避免地深陷建构主义的源自理性自负而招致的危机。集体主义理论具有内在的弱点:为了维护集体的凝聚力,必须限制个体的自由意志。个体自由意志被限制,会打击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削弱集体延展的基础^{[6]89}。自由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价值,没有自由的个体或者自由不被重视的个体,很难组成一个普遍正义的社会。

关于前提3的阐释。假定前提1和前提2是确立的,也不能得出前提3是成立的。本性良善之人出于对普遍正义生活的向往而组建乌托邦,而乌托邦的秩序建构是一种在知识的精确控制下的行为,是一种人为的创造过程。人类在自己头脑中创造出的科学世界,可以看作是一组人为设计的规则。鉴于规则设计者的个体局限性,乌托邦的总体建构和持续动态的社会生活之间存在持久的冲突^{[6]32},乌托邦的秩序建构总是无法满足乌托邦的价值追求的。乌托邦与政治现实是对立的,乌托邦是政治现实的否定,政治现实则是乌托邦的终止。抽象观念形式的乌托邦,一旦企图通过社会乌托邦工程,转化为具象物化形式的乌托邦,那么乌托邦本身所主张的永恒反思就面临终结,从而毁灭了乌托邦存在的合法性^{[4]11}。

关于前提4的阐释。人天生是有差异的,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乌托邦要求在制度化的生活中消除成员之间的差异,实行集体主义的分配式的结果正义,其逻辑后果就是以集体自由的名义压制个

^①在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中,罗氏认为,理性的博弈者最终会采取一致行动以保证各方利益的实现。但是,按照罗尔斯的分析,在“无知之幕”中实际上还是有据可依的,即博弈者会作出趋同选择。但是,罗尔斯进行的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性分析,与现实生活并不完全一致。

人自由,对形式平等的关注取代了其他目标。而平等主义的可接受性完全依赖于这一观念的正当性与否,即平等是否是一种基本价值。只有理解了平等这一概念,才能解决以上问题。首先,要区分形式平等(formal equality)和实质平等(substantive equality)。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事物具有平等的地位,那么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它们是没有理由的。并且,如果它们具有不平等的地位,那么,以同一种方式对待它们也是没有理由的^{[7]117}。实质平等,即每个人的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受到相同的对待。它意味着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他或她的自主生活的能力。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这就要求政治纲领反映这些差异。因此,平等主义常规性地包含了不平等的对待^{[7]119}。乌托邦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混合在一起不加区分,产生了一种过分的积极自由,造成对个体权利的侵犯。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是矛盾的集体式的,它的积极目标和消极目标不能相容。追求使邪恶较少盛行这一消极目标的一种方式是人们集体地为道德团体中的其他成员——这个团体的核心价值是他们认同的,他们并据此而行动——对施行的邪恶行为承担责任,并敦促他们和他们的团体承担集体责任。然而,这样就降低了他们的自主,并破坏了积极目标,因为这会要求他们为他们不能控制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使邪恶较少盛行再一次与使人们更为自主不能相容^{[7]114}。乌托邦对形式平等的追求导致了对差别待遇的不能接受,因而要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强权的介入,必然对个体的权利形成侵犯,形成了新的不公平^[8]。

三、乌托邦的困顿与价值

乌托邦逻辑前提的内在悖论,预设了乌托邦的困顿。乌托邦一旦用来指引现实生活,就会导致自我否定。乌托邦存在两种情形。其一,乌托邦以一种观念形式存在,是一种回避现实、与现实划清界限的“纯粹”精神现象。其二,乌托邦以一种社会运动形式存在,而运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反乌托邦的。所以,冷静地分析乌托邦的终极价值,不论是纯粹观念意义的乌托邦,还是表现为一种具体运动形式的乌托邦,对人类福祉都极有可能是有害的。某种意义上看,乌托邦就是一种宗教。但是,作为宗教意义上的乌托邦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有所差别。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强调彼岸的幸福,否定或者回避现实生活的价值判断问题。而乌托邦却是以人世的普遍正义为诉求的,一切乌托邦主义者都在描绘和论证一种反现实的美好的乌托邦生活。健康的宗教对人类的生活是无害的,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精神抚慰。乌托邦则极有可能形成危害,因为它终究是要按照乌托邦的设想力图改造世界,如果不是如此,则乌托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乌托邦的危害性的根源在于对知识的过度自负,力图凭借无限的理性力量重构一个美好世界。哈耶克反复强调,人类不可对自己的理性做过高的期望。人类在合作中不断扩展秩序,人类的生存境况并不是人类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9]。

尽管乌托邦疑云密布漏洞百出,但不能由此否定了乌托邦的价值。

(一) 为希望提供哲学

人类经历了现代性的去昧之后,源于自然的和源于神的神圣价值渐渐被逐出时间的谱系,以共同体命运为优先原则的总体性秩序逐渐崩溃消解,社会碎裂化为自由的理性个体的自由意志的交锋与耦合的计算与算计的大商场。基于理性精神重视世俗生活的当下的现代性意识碾压了一切,未来不再具有可能的变化性,仅仅是现在的复制与延续,由此人类走到了时间的终点。“人本身变成了物”^[10],失去了希望,希望的消解导致了人的生命困顿。人的生命本质源自人的物性和人的神性的交融。人的物性意味着人具有物的自然需求;人的神性意味着人对无限美好的生命存在的孜孜不倦的探寻,时间由此不息。乌托邦植根于人的生命存在本身,表现了人的本质所是的内容^[11]。乌托邦不同于幻想,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上,乌托邦则蕴含了希望,坚守对现实苦难的批判,对苦难根源的不懈追问,相

信未来可以变得更好,为人类时间序列的无限展开提供了可能^[12]。人不是自然的被完成的静止的物,而是面向未来自主自为自由选择自我理解自我超越的具有变化可能性的生命。乌托邦在人类的物性和神性之间,提供了宝贵的哲学导引,使希望得以永续,从而保全了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

(二) 为文化立心

商业时代确立了资本的话语体系,交易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利益成为个体行动的基本关切。市场交易促进了以自由、平等、法治为表征的现代商业文化的生成与延展,同时也释放了资本的贪婪性、奢侈性和世俗性的文化破坏力^[13]。商业社会里,“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周围的邻人”^[14]。利益主导的商业文化是一种消极美德的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同情、友谊、善良、热忱、帮助、怜悯、良心、关爱等诸多道德主张的消解。消费主义的流行与消费社会的形成相伴相生,进而引发深重的文化世俗化的危机。乌托邦拒绝文化的世俗化,主张建立美丽新世界。在乌托邦的文化诉求里,人与人之间不是撕裂与冷漠,而是互助与共生,由碎片化的“我的生产,我的消费”转向共同体意识下的“我们的生产,我们的消费”。乌托邦为商业时代的文化危机,提供了一种总体性解决思路,立意在文化中重建“琴棋曲赋诗酒花茶”的审美意识和生命向度,以谋求诗意的个体与谐合的群体的交融共生。

(三) 对经济的补救

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是在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展开的一种市场经济体系。市场经济体系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经济平等观,强调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原则、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理论预设^[15],通过清晰的产权制度和交易法则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地悲剧”导致的效率损失,由此确立了自身的合理性。然而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可避免地导致财产占有的不平等,从而衍生出经济撕裂,社会稳定面临极大的风险,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合理的市场经济需要确保两类公平:机会的公平和应得的公平^[16]。乌托邦在经济领域所主张的公有制安排,“我们”生产“我们”消费,无疑是对市场经济体系无力解决的内在风险的一种可能补救。补救的方向在于寻求私有制经济体和公有制经济体之间的有效平衡。

(四) 对政治的辩护

商业时代解放了个体,个性张扬的剧场社会得以弥漫。在个体自由、争名逐利、梦死醉生的剧本的设定下,现代人以模式化标准化的演员姿态,单调地上演一幕幕以自私为中心的人间戏剧。政治被要求保持沉默,国家仅仅在诺奇克的“最弱意义”上保留有限的安保角色。商业时代的剧场社会中,被简单物化的人,面临个体自身无力消解的空虚、焦虑、匮乏。现代社会面临无处不在的文化危机和经济危机,亟需救场者的来临。乌托邦对商业剧场社会的永恒批判,为政治的进场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政治是国家基于国家权力,关于国民根本利益的全局性统筹、变革与协调^[17]。正是由于政治的进场,商业时代在一次次碎裂之际,被一次次地予以总体性修复。

四、如何面向乌托邦

乌托邦体系的存在,始终为尘俗的叙事提供了永在的持续批判。在尘俗的叙事话语里,生命的谱系时常被简单化为具体的一串又一串的物化符号。对物化符号的追求,消解了其他一切可能的生命向往。在这一现代社会的时间序列里,生命本身内在的价值及其向度,常常被无情地消解了。尤其在人类进入工业化、商业化时代的现代性生存场境中,生命的内在本原——即对真、善、美的永恒期盼,日渐被塞进密封的容器内,终日不见阳光。缺乏阳光照耀的黯淡生命,在物化的尘俗叙事节奏里,关切的内容,仅仅只在于肉身的刺激。诸多曼妙的生命华章,如中华自庄子以来的自然“逍遥”意向,魏晋以来所

形成的“竹林问道”的士人风度,日渐退场。生命的爆发力,被强大物化符号的重重罗网幽困于深不可测的意义虚无的尘俗洪流中,谱写了生命悲歌。乌托邦的叙事逻辑,为冲破压制生命之花的尘俗罗网,提供了路标和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体系的价值,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乌托邦体系的存在,对个体生命体验中的焦虑、紧张、癫狂、孤独、恐惧提供了自力救济的理论与方法,从而给个体生命以抚慰;同时,乌托邦体系的存在,也为人类思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选择和设定,提供了理论与方法,提示人类在考虑整体秩序的时候,除了考虑尘俗的叙事机理之外,必须始终彰显生命的内在诉求。

人类在意识到乌托邦体系的价值的时候,也必须严肃地关注乌托邦的叙事机理及其困顿,清醒地意识到乌托邦实践的不可能性。不能企图将永恒演进的时间序列里某个具体时点上所存在的乌托邦体系,强制地设定为具体的静止的规范和秩序,从而导致人类强行修筑阻挡时间行进的大坝,阻遏时间序列的展开。如此,就会形成乌托邦生命梦想的悖反。乌托邦体系本身,也只是某个具体时点的所思,必然存在诸多的不周延性。因此,人类时间序列里的具体的乌托邦构想,都毫无例外地具有自身的有限性。人类断然不能将有限性的乌托邦体系,拓展为无限性的绝对命令。乌托邦体系本身,也必须在时间的河流里,不断吸取营养,与时俱进,从而为人类的生命梦想,提供持续的观照。

参考文献:

- [1] 蒂里希. 政治期望[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69.
- [2] 傅立叶. 傅立叶选集:第二卷[M]. 赵俊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5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 [4] 陈周旺. 正义之善——论乌托邦的政治意义[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 [5] 哈耶克. 哈耶克论文集[M]. 邓正来,译.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83.
- [6]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M]. 冯克利,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7] 约翰·凯克斯. 反对自由主义[M]. 应奇,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8] 安东尼·德·雅赛. 重申自由主义[M]. 陈茅,徐力源,刘春瑞,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8.
- [9] 哈耶克. 致命的自负[M]. 冯克利,胡晋华,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 [10] 卡尔·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周继荣,李书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6-268.
- [11] 蒂里希. 蒂里希选集[M]. 何光沪,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9:135.
- [12] 贺来. 乌托邦精神与哲学合法性辩护[J]. 中国社会科学,2013(7):40-58.
- [13] 靳凤林. 资本的道德二重性与资本权力化[J]. 哲学研究,2014(12):86-89.
- [14]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M]. 蒋自强,钦北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0.
- [15] 吴易风. 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评西方经济学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的论战[J]. 中国社会科学,1993(2):3-22.
- [16] 龚群.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正义[J]. 哲学研究,2013(2):114-117.
- [17] 陈荷夫. 试论政治及政治学范畴与体系[J]. 政治学研究,2001(1):19-25.

(责任编辑 陶舒亚)